

=====

文革博物馆通讯（九九七）·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六五期（zk1903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出版）

---

## 本期目录

【研究报告】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杨继绳
【史海钩沉】	1965：“文革”前最富足的年代	石剑峰·金大陆
【不堪回首】	疯狂年代的荒唐事	冯印谱
【往事非烟】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五）	傅培程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 【研究报告】

####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

· 杨继绳 ·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逝世。27天以后，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的策划和组织下，毛的夫人江青和其他三位文革领导骨干被捕。当时称为“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11大政治报告中说：“历时11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状态是什么样呢？

#### ◇ 统制经济

当时运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状况是：

第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在农业方面，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为主，1980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54000个。参加人民公社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1）

在工业总值中，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0%，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0%，没有私营工业。（2）1978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二者合计占职工总数的100%。（3）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当时称为统收统支。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按劳分配。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40元左右。文革中，按劳分配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一台是7500马力，1905年造；另一台是6400马力，1887年造。抗日战争时期这两台机器从汉阳运到重庆，文革时已经破旧不堪，热效率只有4%。如果改用电动机，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180万元，但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475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1965年就向上级打报告，等待了17年才获批准。（4）

在农村，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每年吃多少口粮，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每天早晨，农民聚集在村头大树底下等候队长派工。“出工不出力”的情况普遍存在。

由于物资极度匮乏，粮、油、布、糖、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数十种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出省必须带全国粮票。提交省公安厅的证明才能换取全国粮票。农民除了参加集体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生产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百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5）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必然错误百出。名为“计划经济”，实际是“统制经济”。在统制经济体制下，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苦心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能力。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工人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统制经济和专制政治是相互依存的。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中央计划，就不能有“杂音”和“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 ◇ 专制政治

当时的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文革初期这个制度受到冲击，文革后期基本恢复到文革前的状态。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

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处，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1949年建立的政权经过二十多年细密化，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totalitarian system（译为“极权制度”）可以作为它的近义词。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

制度是一个“范”，即浇铸铸件的模型。不管怎么样坚硬的金属，只要熔化成液体注入这个模型里，出来都是一个样子。不管什么人进入极权制度这个模型，出来都是两个背靠背的连体人：专制者和奴隶的连体，在下级面前是专制者，在上级面前是奴隶。这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 ◇ 一党专政

在这个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文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3500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共是执政党，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每一个农村生产队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从中央到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都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一把手说了算。

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当时也有“民主党派”，但这些“民主党派”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些“民主党派”的一把手多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共产党员。在财务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所以，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而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具。中国实际只有一个政党，它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宣称，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党的利益。按照社会学的看法，一个集团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就不可能成为集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它除了谋求国家的利益以外（因为它是执政党），也得顾及本身的利益。这个强大的利益集团是中国的客观存在。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得面对这个庞大而强大的利益集团。

## ◇ 党指挥枪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用枪杆子来保卫。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文革结束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400多万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它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通讯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和100多所军事院校，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拔尖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

“党指挥枪”是一条治军的重要原则。它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率全军。中央军委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中央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此外，毛泽东还采用中国历代的监军制，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了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就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得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军队不能就地筹饷。军阀割据的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就没有可能实行军事割据。

六、“双长制”。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相互制衡。他们不能共同策划和实施反对上级的军事行动。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自负责。而这三者都由中央军委统率。

八、强干弱枝。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军委主席这个职务是中国的权力之柄。谁握住了这个“柄”，谁就有可能保持或改变中国的面貌。

#### ◇ 舆论一律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高度的舆论一律。

中共中央既是权力中心，也是真理中心和信息中心。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集中一切智慧，全力论证共产党政权正确性；一切文化艺术团体，都极尽才华，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一切新闻机构，都夜以继日地发布证实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新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把树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当作第一任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文艺团体、新闻机构、学校，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垄断思想，垄断精神，垄断舆论的机器，都在时时刻刻地塑造着青少年的灵魂。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也为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除了社科、新闻、文艺、教育的强力灌输以外，组织灌输更为有力。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围又有一批骨干分子，一层控制一层，一层效忠一层。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成百上千次的大小会议，表彰和批评，奖励与惩罚，把人们的思想引上了单一的轨道。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坐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控制思想。

运用政权的力量，将共产主义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了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不愿为“大我”作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大中学校的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一方面，严厉禁止发表有损共产主义的言论；另一方面，歇尽全力地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对其它社会理论一无所知。

文革中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中共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版式与《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官员。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切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

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当年的中国文艺是造神文艺。

除了一次又一次地思想整肃以外，在经常情况下靠“文化官僚阶层”来保持思想的统一。文化官僚阶层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掌管者，他们把当权者的政治目标从上到下地贯彻到整个思想文化空间，左右着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官僚阶层不仅存在于政府管理文化的部门，还在各个文化专业的领导岗位上，在知识生产的第一线进行监督。

在那个时代，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 ◇ 身份社会

当时的中国是身份社会。身份把人们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身份决定了人们终生的命运。那时，中国人有以下几种身份：

阶级斗争学说造就的政治身份——在农村：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在城市：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城市贫民、店员、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资本家等。此外，在城乡还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地、富、反、坏、右”被称为“黑五类”，另外还加上了“走资派”这种身份。

政治身份把人从政治上划为上、中、下三等。下等身份的人是政治贱民。当时的政治贱民大约有三千万人，加上他们的亲属，超过了一亿人。下等身份的人得不到官方和公众的信任，人们不敢与他们亲近，上、中等身份的人不愿意与下等身份的家庭通婚。相当多的地富子女只好“打光棍”。下等身份的子女不能参军；有的人考大学时虽然得分很高，但“不宜录取”。一旦发生了政治案件或刑事案件，下等身份的人总是首先被怀疑和被审查的对象。长达20多年的政治歧视对他们形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家庭中始终笼罩着阴影。

政治身份带有先天的、不可逾越的性质，还有继承性。如“地富子女”就是继承的身份。

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有城市户口身份的人除了可以享受城市物质文明以外，还可以比农村户口享有很多优惠：就业优惠，城市户口可以得到就业指标；经济优惠，买东西可以得到种种物价补贴。有城市户口的人可以得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所带来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世袭的。一个初生婴儿就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优越性。

户籍身份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划成两个等级差别很大的阶层，这两种身份的人基本是不通婚的。如果一个城里男子找一个“农村户口”的女子为妻，这个家庭就注定不幸：他的妻子在城里不可能有工作机会，他们的子女也随母亲而成为“农村户口”身份的人。

就城市户口而言，中央直辖市、省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的户口也有很大差别。从上一个级别的城市可以向下一个级别的城市调动，从下一级城市调到上一级城市非常困难。那时，由于夫妻分处在不同等级的户口地区，十年、二十年调不到一起的是常事。在80年代初，仅厂矿企业，全国就有600万对夫妻分居两地。这些“牛郎织女”每年团聚一次，一年的家庭积累全部都交给了铁路和公路。

由于户籍身份的限制，人才不能流动，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施展的条件，需要人才的单位得不到人才。中国杂技团因受进京户口的限制，除1953年面向全国招收过一次学员外，30多年一直被限定在只能在北京招人，面对距京仅有200多公里，杂技之乡河北省吴桥的尖子演员，也只能望才兴叹。

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在人事管理中，工人和干部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工人编制的人很难进入干部编制，干部编制的人除非犯了错误，是不会转入工人编制的。在军队里，当了排长才进入了干部系列。服役期满，干部“转业”到地方还是干部身份，不管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来的，都可以吃商品粮。战士服役期满只能“复员”，原来是工人的还回去当工人，原来是农民的还回去当农民。

干部是管理者，是官员；工人是被管理者，是群众。前者是有力量的，后者是受权力管辖的。这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工资类别、福利待遇、住房面积、医疗退休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所以，工人如果能够转为干部，那是很重要的身份跨越。但是，绝大多数工人是很难跨越的，其难度不亚于从农民跨越到工人。

因单位的资源占有多少不同，而形成的单位身份——某人工作单位的行政级别对他的身份也有影响。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一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都与单位有关。单位的级别高、地位高，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高。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和省级单位工作的人身份不同。在省里工作的人，和在县里工作的人身份也不相同。企业分为局级企业、处级企业、科级企业，这种划分是以其占有和支配资源多少为依据的。控制资源多的单位、接近权力中心的单位，社会地位就高，其职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

“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当时没有私有制企业，但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集体所有制中，因企业创办单位的背景不同又分为“大集体”（属第二轻工业系统管辖）、街办工厂（属街道管辖）等高低不同的情况。工作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街道企业的职工，工资、福利、医疗及养老保障有很大差别，在社会声望上也高低不同。“国营企业职工”、“集体企业职工”、“街道工厂职工”是高低不同的社会身份。

#### ◇ 对外封锁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大力批判“三和一少”、“三降一灭”〔6〕，实行“三斗一多”：同帝国主义斗，同修正主义斗，同各国反动派斗，多支持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文革后期“三斗一多”有所松动。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冻。这是毛为了对付苏联的威胁，实施的“以夷制夷”策略，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文革后期，经毛批准，引进了若干套化肥设备、化纤设备，也不是对外开放。文革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文革结束时，中国的大门基本是关闭的。

1980年，中国外贸进口总额为195.5亿美元，占世界进口额总计20487.3亿美元的9.5%；中国的出口总额为182.7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1990

5·7亿美元的9·2%。〔7〕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上没有外国商品，图书馆里没有外国的期刊，工厂里没有国外的新技术……对外科技文化交流基本停止。除了高级领导人出访以外，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没有出国的机会。在1970年代末期，出国服装是借的。一些有外事活动的单位，根据本单位几个领导人的身材，做几套服装，像道具一样，谁有外事活动谁穿。那时，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很少。偶尔来了几个外国人，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对他们的蓝眼睛、黄头发看个不够。围观、尾随的现象经常发生，以致刚刚实行对外开放时，不得不教育群众不要围观、尾随外国人。

#### ◇ 多数人期待改革开放

统制经济、专制政治、一党专政、党指挥枪、舆论一律、身份社会、对外封锁，是文革结束时的中国状态。

文革把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推向了极端，推向了多数人认为非改不可的地步。文革结束，中国人期待和预感有一个巨变。物极必反。文革从反面为中国巨变创造了条件：

第一，文革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领导人的高大形象。文革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当权者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监督权力的前提，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文革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革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塌。中国人开始摆脱几十年的精神锁链，从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相当多的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还有“信心危机”。群众对文革中和文革前的那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丧失信心，从而产生制度改革的要求和对新制度的探索。

正是官方感到的“三信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都是打破精神桎梏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种思想解放运动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锈迹斑斑。部分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隆而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翘首以待。



可惜的是，当时的执政者华国锋没有看到社会巨变的前兆。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的提出无疑有历史惯性的作用。华国锋虽然有抓捕毛泽东夫人的勇气，却没有摆脱历史惯性力量。

在“两个凡是”的约束下，华国锋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方针。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帮”和“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治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华国锋要求各地建设“大寨县”，坚持农业集体化，反对农村包产到户。

揭、批“四人帮”还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揭、批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掌握权力以后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当时需要揭批的是“四人帮”的政治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然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就不仅不可能批判这一政治路线，还必须高举这一旗帜。当时的报刊的宣传逻辑混乱，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8〕；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上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9〕；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因言论罪于1976年12月9日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提出了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1977年12月4日被枪毙。华国锋主政期间，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这些被杀的人，多数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下来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很难有所作为；“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

#### ◇ 政治合力决定改革方向

中国必须转变。然而，向哪个方向转变，则是由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来决定的。各股政治力量较量后形成的合力的方向，就是中国改革的方向。

毛泽东逝世后，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选择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

粉碎了“四人帮”，这股政治力量大为削弱。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两个凡是”表明，华国锋坚持第一种选择，至少是暂时屈服于第一种选择。

显然，这种选择违背了民意，违背了时代的需要。经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力量的不懈斗争，“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国锋被迫下台，坚持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失败。但是，他们的思想影响还存在，其影响附着在第二种选择之中，有时成为第二种选择的同盟军。

第二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即坚持计划经济为主。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搞一点市场调节，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选择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不过，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提出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主张的代表。

第四种选择是，放弃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这就是自由民主派。在改革初期，宣扬这种看法是要杀头的。在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它只存在于少数知识分子中间。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和转轨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是社会主流思想。第四种选择的的思想，在支持第三种选择中寻找表达空间，有时成为第三种选择的同盟军。

“凡是派”被否定，第四种选择的的力量处于边缘地位。第二种选择和第三种选择处在权力中心，二者都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较多的支持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进入，第四种选择的政治力量也在悄悄地发展。另一方面，如果邓小平的改革出现了不良的后果，燃灰未冷的第一种选择也可能死灰复燃。

这四种选择的四种政治力量，排成系列形成当时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的残余力量，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连续的政治光谱中，有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选择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选择。邓小平倾向市场经济，陈云倾向计划经济，二人多有摩擦，相互制衡。一些重大问题，需要两人都同意才行得通。所以，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力量呈双峰状态。

尽管邓小平和陈云在经济改革方面有着不同的取向，但在政治上完全一致。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邓、陈两人的共识，也是高层官僚集团的共识。

这就是说，当时政治力量的合力的指向是，只能搞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概括这一改革方向。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基本路线”实质是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不过，这里的“中学”是从苏联那里搬过来的政治制度。所以，用“苏学为体，西学为用”比较贴切。

## ◇ 权力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体。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城乡面貌大为改观，不同阶层的人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由于胡耀邦等一批党内开明力量的推动，文革结束后，实现了几项重大的人道主义的壮举：一，平反冤假错案。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有4600多名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恢复原职。文革前历次运动的受害者也部分得到了昭雪。二，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几十万人，除了留下几个象征性的人物外，全都得到了改正。三，给“地、富、反、坏”摘帽，上亿人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这些人道壮举，是政治解冻，不是政治改革。

显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搞改革开放，就是在专制权力体系上嫁接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是权力市场经济〔10〕，即没有制衡的权力操纵市场，控制市场，总揽社会财富。在这种体制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空前的腐败的制度原因。

权力市场经济的恶果是社会失去公正。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上述第一种选择的政治力量活跃起来，他们否定改革开放，企图回到毛时代。一些有识之士主张用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矛盾，即建立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政治体制。他们的主张就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注释：

- 1，张思骞：《1980的中国农业》，载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
- 2，《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194页
- 3，（同上，第111页）
- 4，此资料为本文作者两次采访重庆钢铁公司所得。
- 5，“计划经济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一论断，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有详细的分析，见《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7页，第309—312页。
- 6，三和一少：毛指的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平，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平，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平，这叫三和一少。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三降一灭：就是对帝、修、反投降，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 7，国家统计局：《199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865页
- 8，《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2日。
- 9，《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3日。
- 10，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2010年修订版，天地图书，2010年版，第453页。杨继绳：《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载《方法》1998年第8期，等文章中都分析过权力市场经济。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史海钩沉】

## 1965：“文革”前最富足的年代

• 石剑峰 • 金大陆 •

经过四年的调整，中国国民经济至1965年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原子弹爆炸，石油自给，提前还清了外债，“到处莺歌燕舞”。而在此时的上海，市民平均消费水平也在平稳增长中，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始终并未被频密的政治运动而彻底扼杀。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认为，“金钱”、“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上海市民的意识中。即便经历了“文革”“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礼”，仍然不曾消散和退却。

问：您之前写了一本关于“文革”期间上海生活的书《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那么从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上海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比如到1965年，上海的社会生活是否也呈现“非常与正常”的状态？

金大陆：这个话题太大，我仅从当时人们的“金钱观”来讲。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其中有一句“到处莺歌燕舞”印象深刻，好像是在说“形势大好”，实际上“文革”已呈现颓势。再仔细一看，原来这词是毛写于1965年的，是指“文革”运动前形势的。自1961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来，1962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至1965年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原子弹爆炸，石油自给，提前还清了外债等，具体在社会生活方面还表现为：票证供应范围缩小；市场物价回落；给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较大提高，比如全国人均1962年猪肉供应为4.4斤、棉布11.1尺，到1965年为12.6斤、18.5尺等。

上海如何？在上海，从1963年到196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5.82亿元到26.55亿元再到27.13亿元；城乡居民存款则从7.31亿元到8.64亿元再到9.98亿元，说明当时人民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对“金钱”的拥有和支出也是平顺的。至于，是否有人利用职权和机会贪占“金钱”？有材料说，1965年上海共查处犯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错误的党员就达1307人。尽管有理念和程序之差异，但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始终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合法”，还是“不合法”；在于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存款的稳步上升，也代表着当时上海市民物质生活开始丰富，但在这背后是否已经涌动着政治潮流？否则从1965年到1966年，仅仅几个月时间，整个社会就开始集体政治转向。

金：与此同时，“莺歌燕舞”的背后却是“阶级斗争”的潮流涌动，从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到“四清”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批判“封资修”一片萧然，到江青联络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发动“文革”的《评“海瑞罢官”》。包括我们出身不好的在学学生，在入团、升学和日常的活动中，都是明显感觉到压力的。难怪当时不少高层干部对“文革”爆发不理解，愤愤然地说：“因为有饭吃了，所以又要搞了！”

问：您刚才讲到，在“文革”前夕，人民对金钱是有追求的，甚至有党员还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是始终存在的。但随着1965年的结束，1966年“文革”的到来，这种“金钱观”发生了变化吗？

金：“文革”爆发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是“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有极个别的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个街区有个姓花的地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个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卫兵来的，进行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的，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移财产，是藏匿财产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老板了，她就将家中的金条藏在这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红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问：在一般的印象中，因为革命或者“文革”，人们对金钱是没有诉求的，事实是否并非如此？

金：即便“文革”前期，许多事例都证实人们对金钱的认同和追求。下面讲的全是来自档案的材料：1967年时，不少街道工厂挥霍公家的钱，购买电视机、毛巾、保健药品等；筹办一个《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竟然申请二百多人次的出勤补贴，达五千多元。1969年时，上海化工局革委会报告“抄家”物资情况：“全局200个单位有散失、失窃及私自动用的有142个单位，占71%”，一只被偷的钻戒就是从门顶上的肥皂中挖出来的。以上数例均发生于单位体制内，具体表现为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盗“公”为“私”，等等，总之，是通过各种技术性的手段，以“公”为“私”。在此，“公”不仅是大头，更因为是“公”才具备成批量、集团性地化为“私”的可能，即在当事人的普遍的心态和认知中，“公”成为了“私”的源头。

再看发生于1976年的两个事例：1976年时，因有大量的肿瘤病人及家属来往于上海肿瘤医院，其旁边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证交易”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在旅社旁的八十四岁的孤老太康翠英，使用家中的煤炉“代客服务”：代烧鸭子四毛钱一只，代煮蹄膀三毛钱一个，弄得生意火热，群众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于是，康老太扩大生产规模，“从一只炉子扩展到三只炉子，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炉火熊熊”。邻居纷纷效仿，其中一家搭建违章厨房，准备大展“宏图”。

再据1976年6月的简报，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别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东路现场观察，两小时内共发现五处十六人次的摊贩现象，这些摊贩一般都是男女搭档，一个叫卖，一个望风，主要出卖自己编印的《菜谱一百种》《家具图样》《绒线编织法》和《数学游戏》等，能赚不少的钱。

有意思的问题是：这可是私人面对市场的作为，不是揩公家的油，不是吃公家的肥，而是通过自己的劳动，甚至是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创造，看准了市场的缝隙，然后勇敢地扒开这条缝隙，从中既满足和推进了市场的需求，又从市场赚取了钱财。浸润于在中国最大的工商口岸，浸润于百年以来中西方混合的市场运作，上海市民对市场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灵巧，勇敢和智慧。

当然，1976年的面对市场，与1967年利用形势倒卖像章、印制地下报刊的情况不同。近十年来的时空跨越，可见前者是谨慎公开的，后者是刻意隐蔽的；前者是服务于市民生活的，后者是倚仗于政治宣传的；前者具备“劳动致富”的含义，后者属于投机取巧的行为。其间的内容、手段和境况的变化，大致可反映整个社会变化的意涵。

问：社会秩序的混乱恐怕还为一些人提供了更多机会去争取个人物质和利益诉求。

金：这就是所谓“革命诱惑”。革命了，便引动各种利益的诉求，且都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最终发生“经济主义”风潮。当革命造反汹涌而起的时候，对“对象”的恐怖与对“自身”的诱惑是同时伴随着的。其实，在1967年1月反“经济主义风”之前，上海就有民办小学教师和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上海外语学院在读函授生等，吁求“革命资格”的“造反”，目的分明是为了确认“正式编制”的身份认同。所以，“革命”是名义，“资格”是媒介，“身份认同”是实质。

问：普通工人是否也借助“革命”来提高自己的待遇？

金：1967年1月前后，上海确实因各方力量签了一些补加工资、增加福利的条规。结果夺权以后，1967年2月6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提前发放工资的通知》。其中第八条规定：从今年一季度起，恢复“工资基金管理”制度。就是原来当权派签的一切条规都不算，但是可以以去年第四季度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为基准。在此，什么叫“实际支付”，什么叫“总额”，那就是除了工资以外，保留你的奖金。到1967年9月，市革委会劳动工资组下达《意见》，明确规定“按季、按年发放的奖金，节日加班工资等，仍可按原来规定发放”。再到12月份的时候，市革委会工资组有关《请示报告》称：各单位再按“文革”前，即1965年奖金发放水平，但不得增加。年末使用的职工缺勤的奖金，因缺勤病假是要扣奖金的，怎么办？就是到年底的时候综合地发放，但是对“保守派”不再停发奖金，扣除的也不补。同时规定各造反派负责人，都要把奖金维持在原来的状态，原是工人水准的，就拿工人奖金，原是干部水平的就拿干部的。这就告诉我们，上海在“文革”期间，是保留着奖金这一块的。当然，各行业的奖金水平也不一样，如市属交通运输局年七十一元，区属集体所有制房修队年四十五元，菜场年六十元，清洁管理站年三十五元。一般情况每人每月五元至六元。

到了1968年初的时候，对部分资本家、小业主，在奖金上仍然是扣掉的，因为这是“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立场问题。但对所有的群众，仍然是要回到1965年的水平。例如杨浦区房修队革委会通过忆苦思甜、个别谈心，将1966年提高全年奖金额五十五元，改为1965年水平的四十五元。我认为这并不是少要奖金，而更多是集中于政治上的得失考量——或许确实认同、服膺这条革命的红线；或许受制于已变化的身份、角色的限制；或许判断政治上的“得”将大于经济上的“失”。总之，革命造反的政治判断，在是否忠于毛的路线的托举下，占据了上风。如果说这种选择属于革命造反的大势下的“正常”，那么，这种“正常”中，既有“顺应”的一类，即顺从政治趋势；又有“应对”的一类，即利用政治趋势。

当然，这是“上海视角”，因常年政治运动不断，长期不增加工资，以至这份奖金格外重要。许多上海人是把这份奖金纳入正式的收入计划，上海人讲“照牌头”，请病假算准天数“克扣克”，为什么？为了不能“敲奖金”。所以奖金虽然名义上是额外的，是附加的，客观上却是实体性的，计划内的。不知道“文革”时期的北京、天津或者外地的企业是否保留着奖金制，想必是保留的。所以，研究“文革”期间的工资、奖金制度，对全面理解“文革”社会很有价值。

我这里想说的是：至“文革”中后期，关于遗留下来的经济问题，已是在认可并尊重原有工资的框架和体系中，进行柔性的处理了，不再是“文革”初期强暴的侵占和剥夺。这种政策的调整，说明情形变了，境况变了，但根本的革命原则变了没有呢？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变了没有呢？应该都没有，所以这是一种灵活的处理。

问：越到“文革”后期，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是否越来越公开化？或者说，到那个时候，人们开始直接讨论金钱问题？

金：可以这么说。这里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1975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市二中学召开“批判右倾翻案风”现场会，其中有份材料《一堂生动活泼的政治课——记一场“金钱与原则”的辩论》（送审稿），相当典型地记录了“文革”后期，这种思想冲突。现摘录第一回合的辩论：

辩论会开始，红卫兵首先发言：“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为了钞票，这是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我们革命青年绝不应该有这种思想。”

小丁反驳：“你活着要吃饭吗？要吃饭就要钞票，所以钞票是人的第一需要，你们懂吗？”

红卫兵：“那么你是为钞票而活着啰？如果每个人都像你那样只图钞票的话，我们拿什么来建设共产主义？”

小丁被问住了，有同学支持小丁：“建设共产主义，也靠钞票！”

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究竟靠正确路线还是靠钞票？”

同学：“画图要有笔，买笔靠钞票，现在国内外钞票就是决定一切的！”

红卫兵：“那在你看来，钞票和原则哪个重要呢？”

同学：“钞票重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就缺少不了钞票。不然，你废除一下看看，两个钟点之内会发生什么情况？”

红卫兵：“确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商品经济和货币交换，现在我们还不能废除它，因为它还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货币的危害性。”

这时，下课铃响，第一次辩论结束。全班支持小丁观点的有六个同学。

我想问的是，此辩论有可能发生于1965年，或者1966年、1967年、1968年吗？不太可能！有可能发生于1969年、1970年、1971年吗？有可能，但不宜公开。现在，此辩论发生于1975年12月，且以“公开辩论”的形式出现，那么是不是社会变得宽松了？认知变得有弹性了？从政治的角度回答：不是！——反而是九年来的所谓“革命思想教育”，强制、浮夸而空洞，普遍地使人们失去了认同和信任。同时，“商品—货币”的现实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生活。我的结论是：近十年来的“文革”思想路线和价值判断，已丧失了集体认同的群众基础。

□ 原载《东方早报》2013年4月14日第B07版

~~~~~

【不堪回首】

疯狂年代的荒唐事

• 冯印谱 •

网上流传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段子：毛主席逝世了，县上就作了条规定：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有家农民，整整忙了一冬一夏，准备给儿子办婚事，正好料理停当，看好的日子，就在这期间。结婚吧，县上规定不准许；不结吧，经济上损失可就大啦。狠了狠心，壮了壮胆：咱一个小小老百姓，就办这么一桩事，他总不能打成反革命吧。

不料，就真出了事。有人报告，有人请示，有人批准，有人执行——公安干警，吉普出动，一副手铐，一纸逮捕证，将那位胆大农民，押到看守所。婚礼也就砸了锅。

人犯好逮，罪名难定。翻遍法典，也找不下个合适的罪名。幸亏公安局长头脑聪明，眉头一皱，想出个罪名。于是，那个农民胸前挂个大牌子，拉到街上去游斗。群众一看，目瞪口呆，上写“幸灾乐祸犯”五个大字，连被批斗的那位农民，也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段子来自一则“万荣笑话”，原产地就是我的家乡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被收入万荣人编著的好多本笑话集。万荣县人杰地灵，群众文化素质高，长期以来，民间流传着一种自我创作、自我解嘲、自我调侃、相互贬损的文学体裁——“万荣笑话”，由口头传说到形著文字，隐含歌颂、批评、讽刺、抨击于一炉，成为黄土高原一朵怒放的幽默之花。其特点是文字简练，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富有哲理，余韵悠长，听后令人哈哈大笑，笑声中能助人思索和感悟。我的同事、山西日报高级记者管喻数十年致力于“万荣笑话”研究，著作等身。

“文革”十年，类似“万荣笑话”中讲述的这件荒唐事情，数不胜数。

万荣县东部某村一个姓曹的农民，受到县城两大造反派群众组织争斗的革命热情鼓舞，毅然决心弃家投身“革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为了免除后患，也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跟老婆离婚，又抱起自己年仅几岁的孩子，塞进野外一个破窑洞，用土块垒住洞口，孑然一身奔赴县城。幸亏村民及时发现，尾随其后，才将曹某的孩子抢救下来。

曹某的“革命行动”竟然获得造反派一方的赏识，收留他加入造反组织，还被任命为武斗司令，号称“曹司令”。一段时间，曹司令带领武斗人马，在万荣县境内东荡西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老百姓听见曹司令的名字，噤若寒蝉。谁家小孩半夜啼哭，大人就吓唬说：“还不睡觉，曹司令来啦！”小孩听见，立马不哭了。没多久，在一次武斗中，曹司令“光荣牺牲”，倘若此人不死的话，万荣大地不知会酿造出多大的灾难。

“文革”伊始，万荣县委书记阎某某首当其冲，作为“走资派”没完没了遭受造反派批斗。阎书记才华横溢，工作能力强，文章写得好，讲话口才也好。此前，他撰写的《三类寺农业社的教训》一文，毛泽东主席阅后，将题目修改为《严重的教训》，并加了编者按，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开头一句后来成为“文革”警句：“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阎书记参加过1962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千人”大会，跟毛、刘、周、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商国事，见过大世面。我读初中，教我们语文的冯进录老师特敬佩阎书记，多次在课堂讲述说：阎书记为啥能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每年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阎书记都要背诵下来。以此鼓励我们多看书看报，多背诵好文章，练习写好作文。受冯老师影响，阎书记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

有一则版本挺多的“万荣笑话”，讲述的是在批斗阎书记的大会上，造反派严厉审问道：



“阎某某，你老实坦白，你有没有搞过男女关系？”

“搞过。”阎书记回答得特别爽快。

“那你交代，都跟谁搞过？”

“马某某。”

“马某某，她是哪个单位的？”

“本县药材公司。”

造反派一听，如获至宝，立即决定揪出马某某，跟阎书记站在台上一一起进行批斗。结果，令造反派大失所望。原来，阎书记供出的马某某，就是他自己的原配妻子。造反派被阎书记给捉弄了。

后来，县里两派群众组织越斗越凶，由大字报、开大会、口头辩论，发展到了动刀动枪的地步。“走资派”阎书记此时成了没人理睬的“死老虎”，被关在县看守所。这当儿，我们村有一个单身汉，因故被判刑，也被关进了看守所，跟阎书记关在同一牢房。万荣县干旱缺水，县城机关用水要上城中心的池塘拉水。看守所管理民警命令阎书记和我村的单身汉一道拉水。于是，在县城大街上，人们时常看到这样一道风景：一辆小平车上放着一个大汽油桶，里面装满水后，年轻的单身汉为了照顾阎书记，自己在车前驾辕，肩膀搭着拉带用力拉车，阎书记跟随在小平车后面，只有上坡时才帮忙推推车，两个“犯人”配合得相当默契。

到了20世纪70年代，阎书记获得“解放”，被任命到相邻的临猗县担任县委书记。我村的单身汉也刑满释放，在家劳动之余，用高粱秸编制笤帚上集市出售。当时运城地区领导执行极左路线，在全区取缔乡村集贸市场。某次，他上临猗县城赶集，被集市上“撵集”的民兵抓获了，押送至县委大院。单身汉一进县委大门，便扯破嗓子大喊：“阎某某，阎某某，我要见阎某某！”这一叫喊，可把押送他的民兵吓蒙了。天啊！平日里，哪个人吃了豹子胆，敢在县委大院直呼县委书记的大名。他们立即向阎书记汇报，阎书记走出办公室，一眼认出叫喊者是自己的“狱友”。他挺念及旧情，不仅吩咐民兵放人，而且还让县委机关后勤部门全部收购下他携带的笤帚。单身汉回村后，到处吹嘘炫耀此事，还说阎书记请他吃了顿饭。

20世纪90年代，我在山西日报社当记者，一次饭局上，遇见了仰慕已久的阎书记。他后来担任过运城地委副书记、忻州地委书记、省农业厅副厅长等官职，此时退休在山西省关工委发挥余热。席间，我近前向他敬酒，提及当年语文老师讲述他背诵元旦社论的往事，阎书记豪爽举杯，对此并没有否认。我特想当面证实一下有关他的“文革”段子，以及他跟我们村单身汉的交往，几次话到嘴边，又噎了回去。阎书记于2017年谢世，享年90岁。

1972年初夏，我在本村七年制学校读初中。一天夜里，学校突然通知学生到学校紧急集合，有重要政治任务。我急忙赶到学校，操场上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不仅有学生，还有大队基干民兵。人到齐后，大队干部极为严肃又神秘地宣布：省城太原有一名解放军现役军官，在军营杀人后，携带两支手枪潜逃。公安部门分析，逃犯极有可能流窜至我们县孤山一带，命令民兵和学生协助抓捕。毛主席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高大光彩，一个解放军军官竟然杀人潜逃，大家格外震惊，又十分恐惧。

根据分工，大队基干民兵连夜奔赴孤山，参与搜山行动；我们初中生三四人分作一组，在全村各个街道巷口站岗，盘查行人。孤山是万荣县境内一座土石山，海拔1411米，我曾多次上孤山栽种过油松，那里沟壑纵横，搜索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我和几个同学提心

吊胆，又冷又饿，守在一个巷道口，一直站到凌晨两三点钟，才接到撤岗的命令。回到家，父母替我揪心不能入睡。他们询问出啥事了，因为要保密，我以有别的事情搪塞了。

事后真相大白：逃犯为人民解放军驻晋部队63军副军长余洪信。战争年代，余洪信曾荣立战功，逐级升任军级领导。“文革”中，余洪信犯有生活腐化等劣行，告状信递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63军常委会给予余洪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这一处理决定上报到北京军区，没能获得批准。余洪信感觉前景不妙，铤而走险。1972年5月18日凌晨，他从军营手枪班抢走两支手枪，打死了63军政委曹步墀的妻子，打伤了副政委杨兆魁，又打伤了通信员张彦平，携枪潜逃。5月29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山西、内蒙古是重点搜查地区，据说，“山西境内的大小山沟、山洞基本上搜了一遍。”一个月后，余洪信被发现在太原南边的榆次南郊七八公里的麦田自杀，尸体早已腐烂。

#### ◇ 余洪信通缉令

1975年，万荣县南边的临猗县，发生了一起新中国建立后全国金融界第二起大案，临猗县银行有“七万八”现金失盗。“七万八”！对于当时每个劳动日仅挣几毛几分钱的生产队社员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那些日子，街谈巷议，人们总绕不开这一话题，相互猜测盗贼得到那么多钱，会如何花销？哪可是几辈子也花不完的啊？

临猗县巨款失盗案，拖延了两年难以破案。没想到，竟然是在万荣县境，被万荣县机智勇敢的职工、农民和公安民警给破获了。

说来有趣，案犯是临猗县史茂法、史义让两个农民。两盗贼偷窃了一袋子现金，回到村里其中一人家中，当面解开袋子，把一捆捆钞票掏出来，堆放在农家土炕上，一一清点分赃。据说，慌乱之中，不小心把一捆钞票掉落在地上。这一家盗贼的老婆眼疾手快，悄悄一脚，将掉落的那捆钞票踢进了炕洞里。两盗贼把赃款二一添作五分开后，听到社会上盛传银行失盗现金数目是“七万八”，另一盗贼始终闹不明白，为什么盗窃的现金数目跟“七万八”对不上号呢？他询问同伙，同伙自然装聋作哑。他那里晓得，在分赃之前，其同伙已经比他多拿到一捆钞票，上演了一出“黑吃黑”的折子戏。

两盗贼行窃得手后，面对破案风声日紧，订立攻守同盟：三年之内，谁也不许花销一分贼款；等三年过后，人们逐渐遗忘了此事，才可以拿钱消费，随便吃香的喝辣的。可是，熬过了两年，其中一个盗贼再也忍耐不住，违背了盟誓。他不敢在临猗县消费，而是悄悄跑到紧邻的万荣县汉薛公社供销社，购买一辆自行车。没料到，在付款时，被供销社高度警惕的营业员发现了钞票上的破绽，这起轰动全国的“七万八”巨款失盗案遂得告破。

为此，汉薛供销社营业员张生财、万荣县公安局治安股副股长王顺林、汉薛公社电话员张慧芳、万荣银行汉薛营业所职员吴积玉、东阳里治保主任董冬生等5人荣获一等奖；另有万荣县公安局7名干警荣获二等奖，其中就有我的表姐夫史仲兴。万荣县公安局并协助临猗县公安局将涉及此案的7名罪犯一网打尽。此事《万荣县志》有记载。

“文革”期间，新闻媒体天天宣传“狠抓阶级斗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斗争、专政的对象，除了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现行反革命犯、破坏军婚犯、盗窃犯、诈骗犯、强奸犯等，包括本文开头那位“幸灾乐祸犯”。每年过一段时间，如夏收、秋收、春节之前，县革委会都会在县城召开一次全县公判大会。会前几天，被公判的几十个犯人五花大绑，胸前挂着标明本人罪行的牌子，站在解放牌大卡车

上，高鸣大喇叭，拉到全县每个村庄游街示众。公判会上，案犯有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有的被判处无期徒刑；被判处死刑的，公判大会结束后，押赴刑场，立即执行。每一次公判大会，会场人山人海，街道戒严。散会后，不少好事者还会追赶公安局的车队，跑到刑场观看怎样枪毙犯人。

公判大会当天，全县从县城到乡村热闹处，张贴着白纸黑字印刷的公判大会布告，公布每个犯人的罪行和宣判结果。其中死刑犯的名字上面，通常会画上一个血红色对勾，每张布告前围满了热议的人群。个别去过刑场的社员，则会被村民团团包围，一遍又一遍绘声绘色讲述他目睹的血淋淋场景。大概张志新、遇罗克等人，也是经过这样的公判大会被冤杀的。时下有人怀念“文革”期间社会治安“良好”，什么“路不拾遗”，假如能回放一下当年一场场公判大会的实况，就明白什么是“良好”和“路不拾遗”了。退一万步说，即便算是社会治安“良好”，也是阶级斗争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镇压出来的“良好”而已。

有一年，万荣县在召开公判大会前夜，突然，有一个第二天即将被执行的死刑犯供述：他跟姚文元是亲戚，请求刀下留人。姚文元，那可是深得毛主席倚重的“文革红人”，声名显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舆论总管。假如该死刑犯所言属实，确为姚文元的亲戚，出了问题该如何向上面交代？但是，翌日的公判大会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没法改动或取消。县革委会领导紧急协商，临时决定将该死刑犯暂缓执行，将事先印好的公判布告作废，重新印刷新的布告。事后，经一级级向上面请示，据说真的请示到了姚文元那里。姚文元的批复是，他根本不认识此人。该死刑犯的狡黠招术，让自己多活了几天，最终仍然被枪毙了。

呜呼！只有在法治崩溃、道德沦丧、全民疯狂的年代，才会出现上述一件件荒唐至极的怪事，借用一句“文革”热词，全是“咄咄怪事”！

2017年2月26日草于凌空书屋  
2017年2月28日修改  
2018年5月22日再改

（作者简介：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

□ 来源：微信号《新三届》

~~~~~

【往事非烟】

《云卷云舒——清华笔记》（选载之五）

• 傅培程 •

## 第一章 文革在清华

### 五十二、夜访北京铁道学院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开始，北京高校已进入到了武装割据和武装对抗的局面。虽然都有各种组织，多种战斗队，但基本上都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派拥有自己的广播，自己的割据校舍，自己的骨干队伍。到一九六七年年底，两派之间开始用远古时代的武器，如石块、匕首、长矛互相攻击。当时清华大学414派与团派之间已经是火药味很浓了，但还没有进入到大规模武斗的局面。周围高校，如北京铁道学院，北京钢铁学院等已武斗的很厉害了。为

了现场看看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武斗“战场”是什么样的？我和小胖子决定乘夜色掩护，到北京铁道学院现场参观一下，里面有我们“四清”运动时认识的铁院同学。虽然此举很有危险，但年轻好奇，敢想敢为。

铁道学院两派各占据了一个校门，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找到了铁道学院围墙处一个破铁丝网洞钻了进去。来到“四清”时认识的铁院学生王君的宿舍楼下，他下楼来接我们上去。只见楼道口是砖叠的掩体，掩体里堆满了砖头、石块，且有武斗手守备，不认识里面的人根本进不去。进到王君的宿舍一看，真长了见识了：墙角是五、六支用钢管作的长矛，其中有几支长矛头上还焊有一根弯钩状的铁丝，床上有几把明亮的匕首，墙上挂了几只书包，里面装满了砖头，出击时当手榴弹用。窗户都已用木板封死了，防止对方夜里爬进来。昔日书香味儿的学生宿舍已成了挂满武器的堡垒，“四清”时文质彬彬的王君已成了两手拿匕首的斗士。

我问王君：“长矛头上为什么有弯钩状的铁丝？这干什么用的？”

王君说：“这种带钩的长矛扎到对方肚子里，可以将对方肠子拉出来！”

听听也叫人吐舌头！其中一个铁院的学生讲：“很可惜，我们的长矛钢材不好，不是无缝钢管作的，用无缝钢管作的长矛，头一磨尖，那才利呢，一扎一个透！”

这个“透”字充满着血腥味儿。

我向王君打听一起搞“四清”时孟君的情况，王君讲，孟是对立派的，在对面楼里。王君还讲，他不能去对面楼里，进去会被绑架的，我问王君：“我们一起在延庆搞“四清”时大家都是好朋友，你和孟君关系都不错，现在成了仇敌，难道窄路相逢时，互相匕首可以刺的下去吗？”

王君说：“路线前面不分亲友，必要时匕首可以刺的下去！”

我和小胖子听后都默然了，我们告别了王君，悄悄从原铁丝网洞口钻了出来。我们目睹了武斗时学生宿舍改成的武斗堡垒，也洞察到了武斗者的心态，“必要时匕首可以刺的下去！”王君的这句话在我们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

首都北京的高校集中在八大院校一带，昔日书香之地现今成了武斗场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拿着远古时代的长矛、匕首、石块作武器互相厮杀，是谁制造了这样扭曲动乱的社会现象？！昔日的同窗同学，竟会仇恨到可以互相用长矛刺胸，匕首扎心的地步！长矛头上还要焊上钩子，想把对方的肠子给拉出来！是什么理论？什么思维？什么信仰？在促使有文化的大学生们走上拿长矛匕首的武斗之路？这种理论与信仰巧妙又邪恶地操弄着千百万年轻学生朴素的革命情怀，用其巨大的煽动力迷惑着成千上万年轻人走上武斗之路，诱惑他们去摧毁法制与文明，去攻击他人人身，去摧毁对方生命，去制造扭曲恐怖的社会。用进步的世界文明和法制社会的思维来衡量，这种煽动年轻人走上拿匕首长矛道路的理论 and 信仰，其对人类文明具有巨大的破坏力，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它毒害和欺骗了千千万万的纯真的年轻人！它损害了共和国国体，损害了亿万人民，几乎使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沦于崩溃的边缘！

历史的车轮已行进了几十年，当年拿过长矛匕首想刺向自己同学还想把同学肠子拉出来的诸君，不知有否认识到“文革”的邪恶实质？当年千千万万被诱惑和被操纵过的年轻学子

们，想早已走出了“文革”，从当年的“大愚”和“大惑”中清醒过来了吧？是否还有“不堪回首”之感？

### 五十三、清华园里的‘铁甲汽车’

一九六七年秋日，我漫步于清华大礼堂周围，突然看到礼堂旁边的马路上停着一长溜卡车，约有七、八辆。再仔细看一下，发现这完全是“铁甲汽车”！车的四周全用钢板焊固，驾驶窗只留下一个二十公分见方的小孔，供司机看路用，且钢板上弹孔累累。在礼堂前面的广场地上，摆了几十件鲜血浸透的血衣。原来这是东北某一派来京告状的，他们向清华大学师生痛哭流涕的诉说，对立派是如何血腥屠杀他们的。从这弹孔累累的“铁甲汽车”和一大堆血衣可以看出，当地是何等混乱和血腥！完全是真枪实弹！

一九六七年年中以来，全国形势已相当严峻。各省已进入到了全面武斗的局面，这儿“十万火急，”那儿“赴京告状，”国家处于血腥动乱之中。类似在清华大学校院里摆上血衣，演说呼救的场景常能见到。外地不少派别都知道，清华是个藏龙卧虎的大学，里面有不少通天的人，通过在清华校院里的呼救叫冤，阵列血衣，也许可以将信息传达到权力顶峰处。

全国在动乱中，清华园内两派也开始动手动脚，互相广播叫骂，互相剪对方广播线，砸对方喇叭，开始割据校舍，准备武斗凶器。当时的当政者提出的口号是“文攻武卫”，这“武卫”二个字本身就是武斗的代名词。

中国南宋哲学家朱熹有句名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当时，中国“文革”政治的“源头”是“文革”当权者，他们都主张用武，天下还不大乱？“源头”水都浑了，渠水还清得了吗？“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性的血腥武斗牺牲了多少老百姓？九洲黄土下掩埋了多少冤魂？他们极大多数都是被诱惑和被教唆的无辜年轻人。

一天下午去海淀，清华学生去海淀大都穿越北大校园而过，这样路可以近不少。经过北大校园时，只见不少楼宇屋顶上用长竹杆挑挂着一大串破鞋子，有人告诉我，凡屋顶挑挂破鞋的楼宇都是聂元梓的对立派占领的，他们讽刺聂元梓是“破鞋”。

京城乌云密布，各派割据校舍，准备武斗凶器，全国不少地区已进入到了混战的局面中，老百姓生活在高度动荡与血腥的社会里，全国是可悲的政局，一九六七年，是中华大地动乱不堪的岁月！

### 五十四、清华大学旧电机馆内的大武斗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全国已天下大乱，各派都已磨刀霍霍，不少省市已进入到了真刀实枪的武斗中。四川省有些地方，炮都抬了出来，据说重庆市一派警告另一派：必须老老实实放下武器撤出防区，否则炮火无情！十分钟后到你们楼下操场上看弹。果然，十分钟后，三颗炮弹呼啸而来，准确地落在指定的操场上！另一派只能撤退败落，中国不少省份已真枪真炮干上了。

清华大学的旧电机馆是解放前的老建筑，黄色砖墙，墙上爬满藤蔓。位于同方部东边，我们班多次在里面上过课。

一九六八年约三、四月份，一天早晨，传闻旧电机馆即将发生414派与团派的大武斗，我与周君一起跑过去观看，楼下已聚集了一大群围观者。

旧电机馆的二、三楼由414派占领，一楼由团派占领。在大楼西门口，一架云梯架至二楼窗口边，几个414派武斗手拿着长矛往上爬，去增援在二楼死守的同伴。团派则源源不断往一楼运长矛和砖块，这时，几个团派抓住一个414学生往礼堂跑，可能是抓住的俘虏，突然从三楼窗口处贴出一大张白纸黑字的标语：“胜利属于414”！下面具名是“守电机馆全体414战士。”

这时团派的人开始往二楼窗口爬，一个高个子团派武斗手拉开喉咙喊：“同学们！别吵了！现在是拿起武器战斗的时候了！”说毕，他拿着一支钢长矛跳进了二楼窗口。一个矮个子团派朝围观者喊道：“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团派的，不怕死的，进！”说毕，他也拿着长矛跳进了二楼窗口。

下午两点钟，开来了一车解放军，在旧电机馆门口拉开队伍，名之日：“戒严。”其实只是装装样子，并不实质性阻止楼内的血腥武斗，源源不断拥进楼去的团派武斗手，从军人身边经过时并未受阻止。

团派云梯从南面窗口架上去了，武斗手一个个爬云梯而入。另一批团派占领周围建筑物的屋顶，用雨点般的砖块从上而下砸414派，掩护爬云梯的团派登楼。下午四点，旧电机馆内暴发了激烈的厮杀，铁器撞击声、惨烈叫声，追逐扭打声、不断从窗口传出来。414派败退了，从南楼退向北楼，在最后一个西北角房间窗口里，垂下一条绳子，一个414从绳子上滑下来逃走了，第二个414又从这条绳子逃下来，可惜绳断了，他从二楼摔到地上，上面雨点般砖块砸下来，想砸死他。从这个窗口里又跳下几个414学生，一个个摔的半死，有的疼的在地上乱滚！围观人群中冲出414派同学，冒着楼上砸下的雨点般砖块，背起跳楼受伤的414就逃跑。北墙窗户上又逃出来两个414，他俩顺着雨水管一滑到底就跑了。又有一个414，他竟用手攀着墙上的藤蔓而下，虽然这点植物承受不住他的体重，但大大缓冲了落下的速度，他安全逃脱了。更有一个414同学，技惊众人，他从旧电机馆楼上纵身一跃，直飞同方部边上一个厕所的屋顶！将屋顶砸下一个大坑，他从坑中爬出来，又在屋面上跑了四、五步，跳到地面上逃走了。

这次旧电机馆大武斗，414死伤惨重。有一个414伤者从我们身边抬过时，脸如死灰，嘴角往外不断流血。

武斗结束了，奉命来“戒严”的兵也撤了，这血腥的武斗就发生在“负责戒严”的军队眼皮底下。

在首都北京，在“皇城”脚下，在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校园里，更是在北京几十万驻军和几十万首都公检法眼皮下面，发生着如此血腥惨案，令中国社会各界为之震惊！

人们要问：是什么理论？什么信仰？在迷惑和教唆着昔日中国的“太学生”们？使这批有文化的清华学子们拿起长矛刺向自己的同学？中国的“文革”运动向青年学生所灌输的这种邪恶的信仰与理论无疑是世界上最具破坏力、最具煽动力的！它教唆着、欺骗着、毒害着纯真的年轻学子们，它将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推向崩毁的边缘！

清华大学，中国最高的学府，从它建校那天起，没有弥漫过这样的血腥味儿，清华园经历过清皇朝、北洋军阀、民国、国民党统治，直到共和国成立的各个历史阶段，没有清华学

子在自己母校的校园里流下过这么多的鲜血！1968年的血腥岁月，是清华大学的劫难和创伤！也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和耻辱。

## 五十五、全校武斗，逃出清华

自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华两派在旧电机馆血腥武斗开始起，双方纷纷武力割据校舍。我们班男生居住的二号楼被团派占领了，团派武斗手将门窗用木板封死，长矛等武器不断运入楼内，我们这些不参加派别的学生不让再住下去了，四月二十六日夜，团派封楼了，我们卷起铺盖连夜逃离了二号楼，箱子、书籍都还来不及搬出来。当夜，我们十来个同学在清华三院北角的一个教室地上睡了一夜，天一亮即逃往城里，大家都投亲靠友，各自找落脚的地方，我住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我姐夫家里，我姐夫是二外的英语讲师。

虽然人逃出了学校，但通过互传消息，学校内部的武斗情况都能知道个大概。据知情人告诉我，五月下旬的一天，团派包围了414据点东区浴室，在东区浴室一带，两派展开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武斗。浴室里有二十几个414把守着，团派用乱石、燃烧瓶进攻浴室屋顶，屋顶上的414用大衣、棉被包身，持矛固守。团派用云梯从南北两面攻上去，与屋顶上的414拚长矛，团派多人受伤坠下，浴室久攻不下。于是团派用两大桶汽油在浴室下面猛烧！浓烟滚滚，熏的里面人不能坚守。八号楼里几十个414持长矛冲出去解东区浴室之围，团派几百人的长矛队又赶去截击，在清华东大操场，展开了一场几百人的长矛肉搏战！

浴室里的414由于被汽油猛烧烟熏，纷纷昏迷，浴室被团派攻下，里面的414除死伤者外，全部被俘。

第二天，清华414派戴白花，抬着武斗中被打死的414战士尸体，列队从天安门出发，经前门，大栅栏、外交部使馆区、市军管会门前进行大游行，抗议团派屠杀414。

至一九六八年六月，清华武斗又进一步升级，团派大力使用火攻。414退入到科学馆里，团派将科学馆围的水泄不通，断水，断电，里面414在一楼挖井取水。七月，团派火烧科学馆，顿时浓烟滚滚，大火二、三十米高，由于该建筑不是木结构，使躲在一、二层里的414幸免于难。414从外面打地道通往科学馆，欲救出馆内被围414，被团派发现后打退。

一九六八年的炎夏，清华大学处在如此血腥武斗战火中，整个大学大部份学生都逃走了，少数参加武斗的人用长矛、石块、匕首这种中世纪的武器，再加上汽油，互相厮杀。

后人简直不能相信清华大学的这段历史，不是自己是身历那个年代的清华学子，恐怕也难以相信别人的讲述，但这是确切的史实！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在人文荟萃的清华大学校园里，竟会发生着如此血腥的武斗事件！是谁让首都几十万公检法队伍形同虚设不加制止？是谁掌控了首都的军队而不加干涉？是谁睁一眼闭一眼让流血暴行在中国最高学府里施虐？是谁在教唆年轻学生们拿起长矛刺向自己的同学？杜甫在诗中讲：“青史字不泯”，中国的不泯青史在中国历史上要回答这些问题。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老先生还活着，来清华大学看看的话，一定会被这血腥的暴力场面气的两眉倒竖！当他们知道这一切罪恶行径还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还是扛着马列主义红旗来实施的话，两位老祖宗更会气的当场厥倒在清华园的土地上！

## 六十、清华园里的‘青龙骑士’

一九六八年四月，清华大学里两派的武斗已升级，同学们纷纷外逃，我逃出清华后住到我姐夫工作的第二外国语学院里。二外地处北京东郊定福庄，周围有不少稻田，蚊子特别多，有时晚上一巴掌，可以在脸上拍死三、四只带血的蚊子。天天夜里我被咬的无法睡觉。被小虫欺侮奈何？我于是决定冒险回清华大学一次，去自己宿舍里将一顶蚊帐拿回来，自己文革中什么派也没参加过，估计不会有危险。我弟弟告诉我，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在清华二号楼里当门卫，通过这个门卫关系也许可以进到二号楼宿舍去。就这样，在一九六八年的一个夏日，我去了一次已成为战场的清华园。

清华大学校园内已是一片荒芜，除了武斗手们，已看不到一个闲散人员，校舍是静静的，不少窗户用木板封死了，静寂的校园里充满着杀机，武斗手们都埋伏在自己的地盘里。在校园里可以自由走动的都是团派武斗手们，4 1 4派的都已被围困在少数楼宇内，但他们坚守着，不管团派用火攻，断水断粮，都不屈服，死守到底。

在大礼堂前的草地上，我看到了一队团派武斗手们在练习扎长矛，他们的穿着打扮可令人开了眼界：

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闪闪发亮的铜盔，这铜盔做工讲究，造型美观，估计来自真正的消防器材。每人胸前都围了一圈白铁皮做的胸甲，把胸部和腹部都保护起来了，人好象钻在铁皮筒里一样，下身还有两块护腿甲片，每人手持一根三米来长的钢管长矛。这一身穿着打扮，活脱脱的是中世纪的“青龙骑士”！他们排着队在向一棵树投掷长矛。个个功夫都了得，可以在十五、六米开外将长矛投中树干，且牢牢地扎在树身上。如果这一长矛扎在人身，必将对方躯体穿个大洞！这只是在练兵，一有实战情况，他们会毫不留情的将长矛投向昔日同学的胸膛上！

自从人类社会有大学以来，纵观古今中外的世界各地的大学，校园里能出现这样一批手持长矛，头戴铜盔，身披铁皮盔甲的“青龙骑士”的情景，中国名校清华大学是独一无二了。特别是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样的岁月里，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里出现这样一批“青龙骑士”，而且会用真长矛，真匕首刺向自己的同学，那更是让文明社会跌落眼镜了！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制造出多少扭曲的社会现象，清华大学里的“青龙骑士”只是一例罢了。

## 六十一、清华二号楼里所目睹

二号楼是清华大学学生宿舍中体量最大的建筑，里面居住的是土木建筑系和动力农机系的学生，校民乐团和舞蹈队的学生也住在二号楼里。一九六八年全校大武斗开始后，二号楼被团派占领了，成为团派的据点，住在里面的非团派学生全部被团派武斗手赶出去了。

我班共二十五人，大部分都是4 1 4派和无党派的，我就是无党派人士，也被称之“逍遥派”。所以武斗开始时我们都被赶出了宿舍，不少行李都来不及拿出来，我的一条被子还是托人帮忙从四楼窗口抛下来的。被赶出宿舍后我住到二外我姐夫处，由于蚊子咬的厉害，想回校去取蚊帐，那是一个炎夏的中下午，我和弟弟冒险回到武斗中的清华园，我们找到了二号楼这位门卫，他是我弟弟的同班同学，答应帮忙将我们带进去。武斗中的二号楼十分荒凉阴森，窗户都用木板封死了，不见人影，武斗手们都倦伏在里面，这位门卫带我们上



二号楼四楼宿舍去取蚊帐。我们从南边西小门进去，走到三楼西边楼梯口处，突然看到了六、七个人围着一个双手被反捆着的人，不知正在审问他还是正在折磨他，这个被反捆双手的同学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与我一九六二年同一年考入清华大学的土建系房8班的X君，我与他一起上过不少大课，他是414派的，看来他是被团派抓住了。X君也认出我来了，他两眼直直地看着我，这眼光介于疑问和求救之间，他也许在疑问，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二号楼里？也似乎在目示我，求我快点去告诉外面的人，他被团派抓住了，目前正关在二号楼里。谁知我和我弟弟的出现也让团派这批人吃了一惊，他们的头头目光凶狠地盯着我，他知道我不是团派的人，他一边用手迅速往后一挥，示意武斗手将X君拉走，在他指挥下，团派人急忙将X君拉进去了，不让我们看见。他一边凶狠狠地朝我走来，我认出他来了，虽然叫不出名字，这人是土建系房7班的。我似乎感到他想把我也要抓走，武斗中两派都互抓人质，但他可能已察觉到，我是个什么派都不是的人，“文革”中我始终处在“自身难保”的状态中，因为六四年“九评运动”中清理出我有疑问毛泽东有否有个人迷信的言论，如被揭发出来的话，那是要被打残或打死的，所以一直是“无党派”，以求自保。这时这位门卫看到这头头充满对我的敌意，赶紧向他解释道：说我原来就是住在二号楼四楼的，是到自己宿舍里来取一顶蚊帐的，他乃无声又凶狠地凝视着我，我怕有什么变故，急忙离开这是非之地，匆匆地往四楼而去。到四楼自己的房间前，推门进去，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两名武斗手，他们顺手从床上抓起了长矛，一跃下地对我怒吼：“哪个部门的？”我赶紧解释我原来就住在这间房里的，是来取点个人物品的，气氛才缓和下来。往床下一看，箱子没有了，其它物品也一扫而空。

没有拿到蚊帐，却目睹了武斗中清华园里刀光剑影的阴森现场，也看到了一派人活抓另一派人的现场。据说在二号楼里一起被抓的两个414，一位已跳楼死了，另一位就是我看到的X君，据说他后来从垃圾道里逃生走了，捞回了一条命。

一九六八年秋天，武斗平息后，我们毕业分配了，分配时，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通知我，因一九六四年“九评学习”运动中我被清理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动言论”而取消我毕业生资格，去农场劳动。这个决定对我是个重大的打击和不公，当时我去我班级的团支书M女士家中找她，希望她向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说明一下，“九评学习运动”是有清华党委“三不”方针作为承诺的。（对学生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穿鞋子。）在M女士家中，我见到了X君，原来他们在恋爱中。

历史又走过了多少春秋，人生又经过了多少风暴雨狂！后来X君当了大官，M女士当了中官，如果那一天他们夫妇俩有机会看到我这本书，看到这篇短文的话，不知有何感知？明代诗人夏完淳有两句诗：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 原载傅培程著《云卷云舒——清华笔记》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